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强调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

应当重视少先队活动

总政通知全军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从实际出发解决存在问题增进军政军民团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7日发出关于1981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军从实际出发,对拥政爱民活动进行必要的改革,认真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把拥政爱民活动搞得更加深入扎实、生动活泼,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通知说,1981年新年春节期间,各部队要用必要的时间,深入进行人民军队宗旨和拥政爱民的教育。教育要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干部为重点,注意运用政府和人民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开展拥军优属工作的大量事实教育部队,加深部队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影响军政军民关系的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认真研究解决,并向部队进行教育。需要军队和地方解决的问题,要抓紧与地方协商,本着严格要求自己,不给地方出难题,互相体谅、照顾的精神,妥善处理。

通知指出,搞好同兄弟民族的团结,对于巩固边防,反对霸权主义,加强战备,实现四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驻兄弟民族地区的部队,要重温以往军民联防的优良传统,学习中央对当地民族工作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兄弟民族的利益,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工作。

通知说,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是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政策,也是部队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依据,各部队要进一步抓好这一文件的学习,提高认识,落实行动,号召干部战士广泛向家属、亲友和驻地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各部队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形式多样,支援城乡生产建设,广泛开展为人民群众做好事活动,并制定出1981年的支援规划。全体干部战士要发扬雷锋精神,讲文明,有礼貌,守纪律,带头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

通知要求各部队努力创造条件,在新年春节期间积极争取与地方联合召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大会或先进行代表会,推动拥军爱民、拥军优属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大单位还应组织慰问团,带小型精干的文艺演出队或电影组,到灾区和革命老根据地走访慰问。

通知最后说,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加强拥政爱民工作的领导。全军指战员,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搞好军民联防,防止和打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全国各族人民安全、愉快地欢度佳节。

全国生产目的的讨论会闭幕

与会同志指出,多年来生产目的不明确

原因是左倾路线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历时7天的全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会今天在北京闭幕。

会议参加者认为,虽然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确实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明确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脱节,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要求的。

与会同志指出,努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们认为,在生

产建设中,必须首先根据人民的消费需要,安排好消费资料的生产,并安排好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国民经济各部门适当的比例关系。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

会议参加者分析了多年来生产目的实现不好的许多原因,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左倾路线的影响。

新华社
哈尔滨12月9日电 黑龙江省水文地质队党委副书记崔销信,发现他儿子、本队汽车司机崔赫用公款车办私事之后,立即写了一份“自我通报”,经水文地质队党委发给所属9个支部,检查了自己对子女教育不严的错误。

今年10月24日,崔赫私自把公款车开出去为一个熟人办私事,中午回来很晚。崔销信问他干什么去了,崔赫说经过,崔销信狠狠批评了儿子,并让他到财务科补交了6元出车费。崔销信从这件事感到,

“自我通报”
儿子的错误是他平时对子女教育不严所致,他对照《准则》和本队党委制订的遵守《准则》的10条要求检查,已经违反了其中有关规定,因此当天便写出“自我通报”,通报了儿子私自开车办私事的事实和自己平时对子女教育不严的错误,希望全体党员和群众严格监督他和他的子女今后更好地遵守纪律。

水文地质队各支部党员和群众看了这份“自我通报”后,认为领导干部能够这样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说明端正党风是大有希望的。

姚文元丧魂失魄地坐在被告席上,不停地眨着白眼。曾几何时,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权倾一时,何等的威风显赫,而今成了阶下囚。历史公正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原不过是个摇笔杆子杀人的刀笔吏。

在“四人帮”中姚文元执掌宣传大权。全国的宣传、舆论工具,在一个时期内,全部听命于他。“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舆论一律”达到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姚文元正是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批地诬陷忠良,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篡党窃国。

姚文元杀人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悲剧,便是由他制造一连串文字狱而揭开其帷幕的。一篇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一个人的死刑,成了姚文元特有的“政治台历”。

在那无法无天的十年里,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姚文元迫害和屈死在他笔下的,不仅有党政军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文革”一开始,姚文元就和张春桥一起运动群众,指使“造反派”,诬陷上海市委是“黑班子”,诬陷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把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钱中仲华迫害致死。

从1976年1月到9月,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这期间,姚文元开足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法庭上选择几篇文章作为姚文元的罪证。这些文章,都是由姚文元亲自授意、指使,或经他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的。这些文章,诬陷老干部是“右倾翻案势力”、“复辟狂”、“还乡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其中最恶毒的是,197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名义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率先攻击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走向走资派的谬论,为进一步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发出了总攻司令。

在同时期里,姚文元、王洪文亲自布置,先后四次派员到北京的一些部门,和被他们称为“右倾翻案风”刮得严重的省分,“搜集情况”。姚文元曾向“四

诬陷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人证物证俱在 姚文元“认错不认罪”故伎再次失灵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姚文元受审以来一直固守的“认错不认罪”的防线,今天上午在法庭上被推垮了。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上的人证物证说明,他极力把自己的犯罪行为活动说成是工作错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拙劣的辩解。

诬陷老干部“复辟资本主义”

1976年1月到9月,姚文元指使亲信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搜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诬陷重新出山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这是今天法庭调查的第一个内容。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领导成员刘治平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法庭出示的证据,都证明起诉书对姚文元这一罪行的指控属实。鲁瑛和刘治平都说,在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指使下,他们在這段期间曾派出专门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记者近百人次,到福建、云南、江西、浙江、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广西、黑龙江,共11个省和自治区,以及外贸部、七机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搜集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要经姚文元审阅,印成内部材料,欺骗党中央的领导人。法庭出示的由姚文元审批印发的一份《情况汇编》清楚中诬陷说:“从去年夏季开始,邓小平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妄图把学部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阵地”。这份材料说,当时负责学部工作的同志“配合邓小平搞翻案复辟活动”。姚文元审批印发的有关福建运动情况的材料中说,“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网罗叛徒、特反,组织‘还乡团’,摧残‘儿童团’,镇压造反派,涂炭福建人民”。姚文元强加在邓小平、胡乔木、廖志高等同志头上的这些罪名,都是致我矛盾,都是打倒之列,都是滔天大罪,而姚文元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把手头对准了一部分老干部”。但他又辩解称,他“不是有意捏造材料去诬陷他们。”

事实恰恰说明,他们派人到处搜集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为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本身就是大阴谋、大诬陷。他们一伙对此应负的责任,决不是姚文元用“错误”或者“严重错误”的说法所能推卸掉的。

姚文元被问哑了

法庭调查的第二个事实是姚文元把反对张春桥的群众诬陷为“反革命逆流”。1976年3月底清场时,南京市的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总理,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指名“打倒张春桥”,“揪出赫鲁晓夫式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姚文元得知这一情况,又惊又恼。他给徐锡打电话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员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他还要布置‘注意北京的情况’。”

审判员问姚文元,群众起来揭发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抢班夺权,怎么说成反革命逆流?

姚文元狡辩说:“当时在思想上认为出现这种大字报、大标语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反扑,所以我攻击它是反革命逆流。”

审判员一针见血地质问他:南京群众贴出大字报反对张春桥,你把它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在文化大革命中,哪个老革命家没有被贴过大字报,你什么时候说过它是反革命逆流?为什么一贴张春桥的大字报,你就这样“敏感”?开庭受审以来,几乎对法庭的每次提问都进行狡辩的姚文元,这时眨眨眼睛想遁词,结巴了半天,还是哑巴了。

恶毒的一笔

法庭在调查姚文元诬陷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时,出示了姚文元修改定审的三篇《情况汇编》清楚。这三篇清样,加上另一篇清样,都是姚文元“留作历史的纪念”的得意之作。

在“四人帮”一伙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之后,姚文元曾在日记中写道:“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姚文元留下这种“历史的纪念”是为了邀功领赏,还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且不去管他。在今天的法庭上,它却成了姚文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的纪念”、“历史的纪念”其意义就是两条,一是它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二是它完全颠倒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位置。

他修改的第一篇清样原文第一段说:“4月2日,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从4月1日起至2日下午5时止,到广场的人数约有20万左右,花圈一千多个”。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把这段话的第一句“4月2日,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一笔勾掉。于是,这20万人到广场就成了另有目的了。

姚文元修改审定的另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清样中写道:“有十来个小家伙,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头都被打成了几个大包,脸肿

“中国一九八〇”国际旅游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1980”国际旅游会议,历时两天于今日结束。会议是由英国促进旅行社主办,并由这个旅行社和英国《旅游贸易》报以及美国宇宙旅行社联合召开的。24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280名外国旅游人士、报刊记者和航空公司经理,参加了会议。

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旅游业等方面的情况。英国促进旅行社总经理菲利浦·摩来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国外旅游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并且帮助中国方面了解西方旅游者的要求。

有几个家伙,公开叫嚣“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而遭到群众围攻。姚文元把那句反动言论删去,经此一改,群众便成了无精打采的暴徒;

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一倡倡议书,针对当时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姚文元将它改为:“倡议书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秃笔落处,血雨腥风。四次以来,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颠倒历史,混淆黑白,莫此为甚。全世界为之震惊。这将是国际新闻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一页。姚文元事先曾明确“指示”:这篇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报道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他仔细推敲。事后他又批评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报道,“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的”。

当时邓小平已经又一次被“打倒”,靠边站了,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他丝毫没有关系。姚文元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使他人“永世不得翻身”,继续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栽赃诬陷。他亲自授意炮制《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一文,对邓小平进行了全面集中的诬陷。姚文元在最后审定时,亲自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四五”运动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和气势山河的力量,使姚文元看到,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天怒人怨。诬陷、迫害、监禁都不能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在4月3日的日记里,姚文元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作为罪证在法庭放映的这步日记,反映了这个刀笔吏的阴暗而又凶残的内心世界。

法庭把上述被姚文元全文删去的“倡议书”,用幻灯放映了出来。青年工人丁亮的正义声音,回荡在庄严的法庭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们凭共产主义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肿,流着血”。姚文元把其中“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句话和“因此”两字删去,于是就成了:“有十几个小家伙,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这么一改,在姚文元的笔下,诬陷周总理的人被庇护下来,成了无辜的好人,而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却被诬陷为无故打人的暴徒、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这恶毒的一笔,就把人民群众的正义行动,诬陷为反革命行动。

法庭上出示了姚文元4月3日的日记,其中写道:“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左派得逞,……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屠杀、镇压劳动人民。……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公诉人问姚文元:“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

姚文元说:“指一部分群众,但这只是一闪念、感想,没有形成观点。”

公诉人批驳说:“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

当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实姚文元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属实以后,姚文元仍然守着他那条“认错不认罪”的防线。这时,公诉人发言指出,姚文元从审讯开始,在每个问题上都说他有错误或严重错误,但不是犯罪,可是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凡是革命的群众,革命的行动,在他看来都是反革命的。把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说成是资产阶级反扑,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阴谋,这说明,姚文元诬陷迫害人民群众的罪行是严重的,不能推卸的。

姚文元今天在被告席上,同上次一样,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之中。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他的动作有点失常,有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他自己戴不上,需要法警帮助。当审判长最后向他宣布,特别检察院指控他犯罪的事实,法庭已经调查终结时,姚文元紧张得竟说,“我疲劳了,没有听清。”审判长不得不一连给他重复了3遍。

南斯拉夫现代绘画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南斯拉夫现代绘画展览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这个展览展出了18位南斯拉夫美术家的79幅现实主义新形式的作品。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这些作品是南斯拉夫人民当前感情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也是南斯拉夫美术家们在艺术实践中的一种新的探索。

展览会根据中南两国文化合作计划来华展出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特洛依奇,专程来华的萨格勒布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博若·巴克和其他南斯拉夫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南斯拉夫依奇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展览会由中国展览公司举办,在北京展出后,还将去济南、南京展出。

充分认识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

(上接第一版)要看到党风不正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且由来已久,积累的问题甚多,决不是一、二次就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经常抓,永远抓。因此,要有计划地在全党进行党性、党规、党纪的教育,使广大党员懂得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时健全党内生活制度,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增强党员、干部抵制不正之风的自觉性。要选择典型事件,在报纸刊物上展开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动员群众监督党员,动员党员、群众监督领导干部;对于检举揭发党内不正之风的问题和群众,要予以支持和保护,坚决反对压制民主和打击报复。要把查处案件的重点放在当前群众最不满意、对四化危害最大的问题上,实行从重从严、今后从严治党的方针。对于违纪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查清问题,核实材料,并和本人人见面,严格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办事。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增强党内和干部队伍的团结。

认真贯彻执行《准则》,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这是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热切要求,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需要各级领导切实加强领导。

要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努力做出成绩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带头执行《准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党内没有特殊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管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必须按党章和《准则》办事,如有违反,都应接受党的批评教育以至纪律处分。古语说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做出样子,就会带动和鼓舞广大党员自觉地贯彻执行《准则》。

党风的改进,必然影响社会风气向好的方面转变,使得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在一步步地好转。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是变得弱小了,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了。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寄予无限的期望。只要我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奋发努力,就一定能够把党风扭转过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使我们党就会以更大的形象出现在九亿人民群众的心目中。

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

本报记者 林钢

人都”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面前投机。鲁瑛昨天出庭作证。他说,姚文元要鲁瑛传达他的讲话“精神”,而又不许说是他讲的。鲁瑛传达的要点是:“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下去要依靠造反派”“要把眼睛盯住省委”。

那些日子,上百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活跃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科学院、教育部、国防科委等中央机关,足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胡耀邦、赵紫阳、王震、姚依林、胡乔木、彭冲、张养群、周荣章、叶飞、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韩先楚等同志的“材料”。白色恐怖再次出现在祖国大地上。诬陷文宣铺天盖地,各地揪斗和迫害领导干部的法西斯暴行随之达到高潮。

1976年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恩来献花圈。悼念总理的活动迅速遍及全国城乡。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和诗的海洋。丙辰清明前几天,每天有几万群众到广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害。

“四人帮”预感到末日行将来临。他们决定镇压。而为了镇压,先要制造舆论。姚文元干得象戈培尔一样无耻、残忍、毒辣。他打电话给鲁瑛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从一开,姚文元就这样为天安门事件定了性。他亲自布置,派人到现场搜集情况。这些‘内部情况’经过姚文元的曲解和篡改,历史被颠倒了,真理被玷污了,革命者成了反革命,篡党窃国的野心家成了‘中央首长’。”

法庭的小报幕上,映出了姚文元亲笔删改的《情况汇编》清样:

原稿上的“人民群众”,经姚文元一改,变成了“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

人民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被姚文元“分析”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

举世瞩目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连日来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开庭审理。在开庭审理之前，被告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要求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被告人姚文元要求特别法庭为他指定律师辩护。

为被告人辩护，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制度。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按照上述规定，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两个方面：他自己可以进行辩护；他可以委托别人为他进行辩护。他可以委托什么人为他进行辩护呢？《人民法院组织法》第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6条明确规定：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当一个公民被控犯罪的时候，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要确定他有罪还是无罪，犯的是什么罪，罪重还是罪轻，适用什么法律，应当受到什么惩罚。为了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要听取原告一方的控告，也要听取被告一方的辩护，做到“兼听则明”，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既不能枉奸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对真正有罪的人，也要使他受到恰如其分的惩罚。

有人认为，公诉案件一般都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又进

律师为什么要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辩护？

马荣杰

行了审理，自然会作出公正的判决，何必还要律师为被告人辩护？

事实上，被告人常常是需要律师为他进行辩护的。这是因为：第一，律师熟悉法律，能从法律上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意见；第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同在押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这就能在充分掌握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依法提出辩护意见；第三，在确定被告人犯罪之后，就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甚至可能判处死刑，因此他可能产生种种思想顾虑，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他自己进行辩护，而律师则可以充分地提出意见。

法律并未规定什么样的被告人有辩护权，什么样的被告人没有辩护权。就辩护权这一点而论，任何被告人的权利都是同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其他案件的被告人一样，“有权获得辩护”，这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提起“为被告人辩护”，有些同志往往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为他开脱罪责，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

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必须根据事实，依照法律，不能颠倒是非，无理狡辩。第二，律师维护的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合法”二字是很重要的。我国的法律代表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律师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也就符合人民的利益。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着重揭露犯罪的事实，揭露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而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则是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员经过调查，听取双方的意见，然后进行判断，最后进行评议，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审判员、检察员、律师三者的关系是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各自的角度不同，但目的一致：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律师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辩护，也与其他被告人辩护一样，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协助法院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以作出公正的判决。

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有人强令律师违背这个原则进行辩护，那就是对律师工作的粗

暴干涉。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同样也不受被告人的牵制。如果被告人要求律师按照他（她）的意见为他（她）进行辩护，而他（她）的意见是违背事实 and 法律的，那么律师当然不能附和（她）。如果被告人错误地坚持己见，律师就只好拒绝为他（她）辩护。被告人江青最初要求委托律师辩护，但又想要律师做她的“代言人”，代她向法院回答问题，按照她的要求，事实上是要律师违背事实和法律为她进行辩护。这是与律师的职责不相符的，律师自然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她决定不委托律师辩护，律师理所当然地也不为她辩护。

律师为被告人辩护，一般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诉讼程序上审查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是否合法，是否有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之处。第二，律师可以根据证据，说明起诉书所列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有无出入。第三，律师还可以从被告人的动机、目的、犯罪手段、是否自首、有无立功表现、认罪态度好坏，以及故意还是过失、主犯还是从犯、累犯还是偶犯等方面进行辩护。第四，如起诉书引用法律条文不妥，甚至因错引条文而加重了被告人的罪责，律师应当进行辩护。

“收款”不应和“平调”挂在一起批判

张树人

1959年纠正“共产风”错误时，曾提出批判“一平二调三收款”。这里所讲的“一平二调”，是指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无偿抽调属于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员个人的产品和财物。这种“共产风”，侵犯农村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经济利益，显然是错误的，理所当然地应予纠正。当时主要是指国家银行收回了社队应归还的到期农业贷款。国家银行的贷款本应有借有还，这是信用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正当业务活动。那么，“收款”究竟错在哪里？应不应该与“一平二调”挂在一起批判？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实现的。这些经济往来，除国家直接给予的无偿拨款外，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要求，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而不能采取强制剥夺或不等价交换的做法。否则，就会损害对等的经济利益。“一平二调”的错误，就是违背了这一些基本原则。这股“共产风”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

害。后来，党中央纠正了平调的错误，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农民的经济退赔），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克服了暂时的困难，取得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胜利。

本来，根据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及等价原则的正确认识，在纠正“一平二调”错误的同时，并不难进而对当时收回到期农业贷款中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处理。当时银行贷款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影响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当然是应该指出和纠正的。但不能因此就不加区别地提出批判“收款”，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银行收回到期贷款的工作。国家银行向社队发放的农业贷款，是按照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对集体农业经济提供的有偿资金援助。这种援助不同于国家对农业的无偿财政拨款，也不不同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救济，而是以偿还为前提条件的一种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贷款的一方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让渡给借款的一方，在贷出一定期限后，再由借款者把这笔货币资金归还给贷款者，并付出

实可行的劳动工资报酬，以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践证明，那种用几句话的政策来指导工资调整，是不利于人民的内部团结的。至于教育要立法，科研要立法，等等，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运用社会主义立法来调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今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而，把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辅助手段”，是对社会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贬低和削弱，是不利于法制建设的。

三

为什么长时期以来，“辅助手段”论会流行于法学理论界呢？我们认为，这是同对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点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段话所规定的内涵十分明白，是专指“思想性质的问题”和理论学术上的“争论问题”，因而决不能任意引申为是指全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毫无疑问，凡属于这类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是不能用法律来强制的。

思想问题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形式。人民内部矛盾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并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有管理集体和分配制度中的种种矛盾；有积累和消费、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矛盾；有国家机关中的体制、规章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的缺点，以及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间以及他们各自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纷繁复杂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有的则表现为刑事纠纷和民事纠纷。在刑事纠纷中，即使是杀人、诈骗、盗窃，也有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众多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有相当一部分，包括经济、财产关系和诸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必须用法律来进行调整和解决的。

有的同志，还用毛泽东的下面一段话作根据：“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件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十分清楚，这里所提到的“相

从特别检察厅提出的起诉书来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罪行都是十分严重的。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怎样为他们进行辩护呢？我想，首先要针对起诉书所指控的被告人的罪行，看认定的事实有无出入。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辩护。第一，这是反革命集团内的共同犯罪，既然是共犯，各人在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就有所不同，在罪责上也就有轻重。第二，在起诉书所列的48项罪行中，有的罪行是某几个被告人要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也有的罪行与某几个被告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虽有一定关系，但情节上也有所区别，律师可以在这方面进行辩护。第三，有的被告人悔罪表现较好，犯罪后较早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经过法庭查证，表明交代较真实；有的还揭发了同案犯的行径，对查清整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是依法从轻处理的理由，也是辩护人可以为之辩护的根据。

新的律师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时间很短，50年代中期刚刚开办了两年左右即被取消。去年这项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始恢复，因此人们对律师制度的性质、任务以及为什么要为被告人辩护等等都不大了解。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久前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就是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次10位律师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5名主犯出庭辩护，受到了广泛的赞助和支持，为今后律师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一定的利息作为相应的报酬。货币资金的借贷是按照贷出——收回——贷出的公式进行的。如果贷款只借出，不许归还，就有去无回，那就是借款的一方（债务人），剥夺了贷款的一方（债权人）的货币资金所有权，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平调。由此可见，批判“收款”，实质上是在批判“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刮起的让社队从国家之产的“共产风”。

这样就混淆了是非界限，动摇了信用原则，引起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使大量到期农业贷款无法收回。试想，世界上哪有只管贷款不管收款的银行？信用资金只能借出，不能回流，怎么能川流不息，循环周转，进行资金融通呢？这岂不是要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吗？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要给银行以办理贷款业务的自主权。因此，应当重申，有借有还是银行贷款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对于“收款”的批判，应予否定，肃清影响。这有利于解脱由于错误批判收回到期贷款而加在广大银行干部思想上的禁锢，使她们能解放思想，更好地办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真正的银行，更好地发挥调节国民经济的作用，为实现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只是辅助手段吗？

傅昭中 朱文显

这种说法立论的基础，是把法仅仅归结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总是过分强调法在镇压敌对阶级方面的职能，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就算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这些同志不敢承认社会主义法在调整、解决人民内部关系上的重要作用，怕犯“歪曲法的本质”、“鼓吹人民自己向自己专政”的错误。这种法学理论上的片面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列宁指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关于这一定义，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统治阶级要镇压被统治阶级，法是镇压的工具。这是人所共知，不容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和千千万万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之间，尽管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可能没有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法也必然会成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法律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担负着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重任。迄今人们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奴隶制法典——古巴比伦乌理纳穆拉比法典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奴隶主、高利贷者和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借贷和租佃关系、商业买卖和债务关系、婚姻和遗产继承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有关的刑罚规定。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法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方面的作用，还表现在它对本阶级的成员对劳动人民的榨取和欺压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上面。例如，在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历代官宦的贪赃，常常是激起农民起义、动摇封建统治的重要原因。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整个阶级的利益，一般都在历史上作了惩治贪污罪的规定。历史上，凡是高明

的统治者，总是要通过法制来约束本阶级内部的成员，给人民以比较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以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希望维持其政权的长治久安的。也正是这个原因，象包公、海瑞等一些剝削阶级的清官明吏，才有可能运用本阶级的法律，惩治残害劳动人民的恶吏和权贵。

还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也愈来愈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成员、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复杂化。近代资产阶级法律，就更加广泛地调整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资产阶级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在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当然，剝削阶级法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仍然是以阶级基础即于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但是，这种经济关系，不但有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剝削阶级内部的经济关系。

二

如果讲，在剝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经常普遍的存在，因而法律主要表现在对劳动人民的镇压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法律在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它的重要性，而决不只是“辅助手段”了。

在我国现阶段，作为阶级的地主、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应当在调整、解决人民内部的关系和矛盾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如果社会主义法律只是镇压反动阶级的

玉 的 中 有 “美容学博士”、“针灸学博
 摄 鳄 这 里 十五 受骗的人有议员、医生、中

“经营学博士”等等。到鳄鱼，无所不养。别尔别罗夫家的惨痛教训不能不使人提高警惕。

(据新华社)

禁犹太
列强在

史人提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也
直接向四川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每册估价0.35元，
邮挂号，每一至五册加收0.12元。

